■新作聚焦

徐剑报告文学《运河谣》：历史活剧 民生烟火 文化血脉

□木 弓



《运河谣》，徐剑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26年10月

《运河谣》以运河上的12座桥作为叙事结构的基座，从桥心石的水漩纹里读出大运河的前世今生，读出历史、现实和时代。作家细心研读专家的研究成果，掌握大量相关历史资料，同时走访了上百位生活在大运河两边的普通人，把他们的人生融进大运河历史里，演绎出许多运河故事，传递出丰富的历史现实信息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最长的人工运河，贯穿南北四省两市近2000公里，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余年来，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特色，推动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在运河两岸生根开花，大运河也因此成为作家书写和关注的热点。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运河谣》是其中较为优秀的一部。作家全程行走，一路采访，一路怀古，打开思想格局，激活创作灵感，写出了我们民族历史的回响、民生的烟火和文化的血脉，赋能历史精神，呈现时代大主题。

作家行走运河，并不热衷于看水，而是盯上了横跨在河面上的那些古老的桥。作品把焦点对准运河上的12座桥，以这12座桥作为叙事结构的基座，从桥心石的水漩纹里读出大运河的前世今生，读出历史、现实和时代。作家做了相当扎实艰苦的案头工作，细心研读了专家们的研究成果，掌握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与此同时，他走访了上百位生活在大运河两边的普通人，把他们的人生融进大运河历史里，成为大运河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这12座桥，就能演绎出许许多多的运河故事，传递出丰富的历史现实信息，展开独特的京杭大运河叙事。

从杨广到文天祥：千年运河的历史英雄

随着作家对运河之桥历史密码的破解，我们的思绪被带到春秋战国狼烟四起、铁马金戈、诸国纷争的年代。两千多年前，身经百战的君王们最先尝试开辟人工运河，方便运兵运粮，以降低战争成本。当时的运河并无统一规划，全凭各国君主各行其是。直到隋朝统一国家，隋炀帝杨广下决心倾国家之力，启动开通南北大运河的计划，也把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老运河连接起来，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运河的最初形态。从此，南方的粮食通过运河，可以源源不断运至京城。隋朝时，漕粮经运河运到洛阳；唐朝时，再由洛阳转运到长安；元明清改道后，修成直通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拉动了沿线百姓的经济生活，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家经济大动脉。

千年大运河，上演多少历史活剧，淘尽多少英雄豪杰，留下多少悲壮传奇，这一切都在《运河谣》里被一笔带过，作品只聚焦于两位我们熟知的大运河英雄的真实故事：一位是封建王朝的皇帝杨广，一位是国难当头、国祚已尽时的股肱之臣文天祥。两人相差好几个朝代，一个雄踞北方大运河之头，一个受困于大运河之尾。作品写了这一头一尾两位历史人物，意味深长。

尽管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暴君，但恐怕无人否认他主持开凿大运河的历史功绩。他出任扬州总管时，就看到了漕运的国家政治和战略意义。开凿通济渠，将江南的漕粮运至东京，是迁都的配套工程：先建立政治中心，再打通经济动脉，实现“控天下咽喉”的战略布局，这是“历史性的大手笔”。作品高度评价隋炀帝的历史功绩，试图改变以往史书中的负面印象，塑造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形象。与此同时，作品也承认这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并报以惋惜和同情。大运河确实造福了后来的唐朝，为新的盛世提供了重要支撑。历史上，运河的兴衰常被看作国运起伏的写照，所谓“运河兴则国家兴，运河衰则国家衰”。

在国家危难之际，文天祥挺身而出，赴元营谈判，抗辞辩难，被扣后九死一生脱身。南逃时，文天祥再次被元军俘获，誓死不降。崖山之战中他被拘于元军船上，目睹宋军覆亡。后被押大都，囚禁三年，终以不屈就义。常人会认为，文天祥是为一个注定覆亡的王朝献身，有些愚忠。但《运河谣》写文天祥，给出了作家对英雄的理解。在崖山之战前后，文天祥的坚守已从拯救王朝转向捍卫人格气节。他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并以生命践行了这一誓言，彰显出宁折不屈的品格。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品质。文天祥的精神由此上升为国家情怀与民族气节。作品把这种精神融入大运河的书写，铸就了大运河独特的历史精神魂魄。

劳动与劳动者创造了大运河

随着时代变迁，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功能早已废止，其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历史使命也已然完成。但作家徐剑在行走中意外发现，那些桥还在，历经千百年风雨，如今虽有些斑驳，却更透出岁月的包浆。这条人工运河，是一代代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之河。河说到底是老百姓修的，历史说到底是老百姓书写的。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过日子，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养儿育女，生生不息，造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现实场景。《运河谣》正是基于正确的历史观，看到老百姓创造生活的力量，自觉把目光投向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一边放眼历史，一边沉浸于百姓生活之中。

拱宸桥、广济桥、长虹桥、宝带桥、虎踞桥周边的烟火气千年不断。随着京杭大运河再次疏通，生态环境更加宜居，烟火更旺，气氛更浓。周意从小在杭州城拱宸桥的老街长大，考上中国美术学院的视觉艺术专业的她参加了中国女性创业能力开发项目，以《运河南端有个我》为主题，提出了开发运河系列文化产品的创意，得到来自世界各地评委的认可，获得两万美元的资助。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她的创业热情更加高涨，对文化产品的方向把握得也更加精准。如今，她真成了老街上知名的运河女孩。

桥西老街有一个老杭州人，叫徐惠荣，生在贫困家庭，后来自己盖房子、开饭店，挣了不少钱。运河大整治，城中村改造，需要拆饭店，他二话没说，自觉关了饭店，另找谋生的办法。李法根在广济桥下长大，在食品厂干了20多年，36岁时才创业，开了一家糕饼厂，拳头产品是承袭传统工艺的塘栖重麻酥糖。生意火爆起来，每天卖出去的糕点有两三千斤。很快，镇上的人都来开小面点铺，有一千多家，都卖重麻酥糖。李法根带来运河上一道风景，自己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但他也在思考，传统的运河糕点能否吸引年轻一代，能不能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从《运河谣》的章节小标题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沉浸在运河里，将烟火故事信手拈来。如“塘栖的渔夫”“夫妻船”“刘王庙旁的小摊贩”“南湖船娘”“小花本是孙儿男”“一杆秤称花街”“最后的船长”“船世家”“梁山港收编的物流好汉”等，都是些真实平常的百姓故事。许许多多故事集在一起，就把栩栩如生的大运河劳动者形象凸显出来了——劳动与劳动者创造了大运河。

运河沿线的民间文化与非遗传承故事

《运河谣》还有许多引人生出兴趣的小标题，如“画痴吴——运河入梦写丹青”“王家泾，卞家班的擂船”“大厨刻刀下水印蓝花”“红酥手，一针神灵一袂春风”“紫砂壶藏家：泡尽三江买小院”“票友、轮机长、‘昆虫’”“东关街说书人：一把纸扇一河乾坤”“拉魂腔”“石敢当，皮影王”“执子之手，柳琴牵魂”等，说的是另一个侧面——运河的民间文化艺术与非遗传承。运河滋养了民生，自然孕育了文化。看得出，作家对运河民间艺术情有独钟，这些段落都写得细致入微，颇具情趣。

作品中的第一个故事，写的是杭州城的一个画家吴理人。他每天都背着画夹，沿大运河两岸写生。他画各种各样的人物，画小楼店铺、河面风景，运河的一切都收入他的画中。多年来，他的画作真实记录了不同时期运河的风土人情和经济社会，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珍贵的文化价值，他由此也成了画说大运河的第一人。

许永明是嘉兴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其剪纸以蓝印花布纹饰为特色。他从小跟奶奶学剪纸，热爱嘉兴一带民间剪纸艺术，努力向民间艺人学习，大胆探索创新，由此独创了一种新的江南剪纸，获得“省级乡村工匠名师”的称号。

苏绣大师卢建英绣的第一幅人物画，是南宋画家刘松年的工笔画《罗汉图》。后来，她带领苏绣姐妹们坚持创作，不断推出好作品。苏绣价格不断攀升，但绣娘看重的并不只是高价，更是弘扬运河文化。从她绣的《桃花太平鸟图》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强大的传承力。像这样的功夫，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韧性、耐力和定力，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运河山东段，拉魂腔“高腔旷野，长调运河”。王传亮是拉魂腔的传承人。多年来他致力于拉魂腔的抢救和传播，他唱的拉魂腔受人追捧。如今，拉魂腔作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了新一代的传承者。

千年运河流经的许多城市和乡村，都在推进日新月异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孕育当代先进思想与进步文化，为历史经典产业注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为大运河新质生产力赋能。《运河谣》还会传唱下去，明天的大运河之歌，还会更响亮、更动听。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创作谈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徐 剑

我从京华或高原下江南，已经记不住有多少次了。一个边地长大的作家，在北京城生活了30年，仍觉得自己是异乡人。作为军旅作家，我与江南中国和北方中国的对话一直在持续。只是我未曾想到，这场持续多年的对话，后来会因一条长河而获得新的展开。

《运河谣》的选题，缘起于一次钱塘夜话。浙江教育出版集团领导认为，“大江南风月谣”三部曲是个好选题。但在签订合同时，我反倒萌生怯意了。我从小在云南昆明城东的宝象河边长大，那是滇池上游的一条涓涓细流。它虽没有大运河的磅礴，却远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远在大运河开凿之前，就已在这片高原上流淌了。从宝象河走向大运河，从自然造物走向人工开凿，带着边陲的传奇和异域风情，我将南方小桥流水的精美与烟雨江南的朦胧，如工笔画一般描摹、勾勒。从余杭到京都，一个军旅作家，走在大河两岸，看到的是两岸铺展的江山家园，念及的是社稷安危，感受到的是多民族在大河上下游的融合。大河宛如一根负重扁担，把南方的万里稻香和北方的长城原野挑在一起；又宛如一条激滟的纽带，把华夏文明与民族命运连在了一起。

在这条河里，有隋炀帝青春的面孔，也有文天祥士子的面孔。一武一文，一阴一阳：既有孔武有力、韬略治国的帝王气象，也有丹心不减、风骨凛然的士子风采，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强大帝国的气象，依然沉淀在大运河里。河水汤汤，倒映着历朝历代的身影。

作品注重还原历史现场。这不仅是尊重历史，也是敬畏历史。去年5月，《运河谣》终章即将完成时，我又去了文天祥故里，只为核实一个萦绕于心的问题：张千载带回庐陵老家的，究竟是文天祥的头发、牙齿，还是头颅？在研读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过程细节的考证，我以审慎的态度得出结论：张千载带回的应该是牙齿和头发。

对于物理意义上的运河，案头史料阅读愈深，我愈为杨广的命运和大隋朝扼腕长叹，在书中对史学采信野史的做法予以批驳。在杨广之辩中，我先指出魏征、司马光等采信野史、使杨广蒙受污名的问题；继而依据陈寅恪、吕思勉、钱穆的观点，以及美国汉学家芮沃寿的视角，以一种世界的眼光、开放的态度，对杨广进行重新审视、评述，试图从史学家的角度辨伪。杨广多年镇守江都、担任扬州总管，深谙南方经济对于帝国的重要作用。因此，杨广初登皇位，太想有所作为，接连推行了掘堑设防、开凿运河等，足显其政治手段。有些史书为了污名化隋炀帝，引用大量的野史作为佐证，是不可取的。

我还是钟情于当下的大运河。兄弟船、父子船、夫妻船，飘摇在运河之上。不同的故事，相同的船，逐水、依水，人也随了水性。运河上最沉重的劳役，可能曾落在这些船上人的祖辈身上：修河、筑堤、守闸。而最终受益的，是后人。

采访中，我在烟火市井中，撷取生活在运河两岸的传统民俗、生活方式乃至精神信仰，将笔墨留给了运河市井中的船工、绣娘、藏家、美食家，还有非遗传承人、说书人、写村史的人。人间百态由此得以浓缩，一方水土养育出的一方人文气质也由此显现。大国金戈铁马的面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运河的流水之中沉淀下来。他们活在运河的一张年画、一个门神、一场祭祀、一个怀古的节庆里，活在非遗的传承中。同时，书中也有新的拓展：由一个小水泊，看到一个运河上的大港，看到北方的煤如何运到南方，带来一个县、一座小城乃至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

《运河谣》还运用小说的叙事结构，以及散文、报告文学、历史考据的笔法，完成了一次跨文体的“变法”。一河之水，承载了山河壮阔、民族气节与市井人家。一国之命运、一朝之命运、一家之命运、一人之命运，兴衰荣辱事，沉浮百态生，都在一条运河的变迁过程中展开。

可以说，我是带着对先贤、对历史、对众生的敬畏之心写下这本书的。最后，我想以自己写的一首小诗作结：

一舟千载泛清波，雨溅寒江恨泪多。
莫笑少年随逝水，且骑白象赋山河。

■评 论

重新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爱与痛

——读洪放短篇小说集《双琴》

□江 飞

人是情感动物，然而，“情感的爆炸和情感的贬值构成了我们时代精神状况的一体两面”。日益加重的情感危机，给小说创作以新的机遇。小说可以重新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爱与痛，让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有情之人而存在。

洪放最新短篇小说集《双琴》开篇《旗袍》写的是戏曲名角小宛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对曾经的恋人和戏曲的爱与痛。一件开着粉色荷花和青绿莲叶的雪青色旗袍，承载起其生命最后的尊严和光彩。小说透过护工刘爱兰之眼，见证了小宛最后的生命荣光，“她沉浸在戏里。此刻，她已回到了她的戏台。她不是晚期病人叶春翠，而是戏曲里的名角儿小宛。她唱着，流着泪，旋转着。她唱的既是戏剧里的人物，又是她自己。她是将自己和戏剧里的人物唱成一个了。”即使是无可避免的死亡，也因为这短暂的升华和绽放而格外绚丽动人。同名小说《双琴》中的“小若”也是如此。在戏台上带着仇恨，和书生一道被雷电劈死；在戏台下，带着仇恨，逃离青桐。“戏里戏外皆人生，虚虚实实尽人心”，这是小说赋予生命的“临终关怀”，也是作家赋予小说的现实关怀。

背负爱与痛的还有《风骨》中的“大芥子”。在世人眼中，“大芥子”显然是一个靠写江湖体书法混吃挣钱的所谓“大师”，“一派江湖气，忸怩作态，让人看了难受”；而在夜深人静的小屋内，他是潜心静气追求书法技艺、诗书深不见底的“韩铁”。为了给两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继子治病，他到处出席各种活动和宴席，默默承受着责骂、鄙视和疏离，独自面对“自我”与“超我”撕裂的痛苦。他在小屋中完成心性的淬炼和技艺的探索，直至脑出血离世。韩铁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硬劲”，成就了其人格与诗书独有的风骨，让一直自视甚高的“我”（书画评论家约之）不得不承认“第一次看走了眼”。小说以先抑后扬的写法，有力地呈现出一位艺术家在迎合世俗的生存与忠于艺术的追求之间艰难挣扎的状态。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之中”的普遍境遇？

无论是小宛还是韩铁，死亡并不能磨灭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戏曲和书法使其生命以艺术的转化形式得以流传和存在。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死亡，而是对有爱有痛的生命的凝固与漠视。在洪放看来，“短篇小说不可能过于关注宏大叙事，它的功能更多在于揭示人世的幽微与人性的隐晦。生命无常，但生命有内在的定数；人性悲悯，而人性有无法逃离的暗伤。”这部小说集自觉摒弃了宏大叙事，聚焦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内在意味：《大琪的店》由招牌名的更改窥探大琪和小乙顺其自然的爱情；《九命》由一只叫“九命”的猫勾勒出托宠管理员小荒与托管人Ghost之间的生命交集；《切割》以小说家“我”和人形机器人研发员西平被切割的生活，表征现代人在精神与物质、颓废与进取、现实与虚无之间彷徨无措的状态；《人鱼》由人鱼表演展现唐小念、胡冬与王冉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过境》书写殡仪馆小卞完成先锋诗人老阚最后的托付；《五十寿》通过艺术家凤歧的出走与归来致敬一场20年前的爱恋；《午宴图》通过一次平常的午宴再现相濡以沫16年的半路夫妻老闵和初丽的生离死别。人生无大事，洪放借人物之口进而说道：“人生的任何事都是有定数的。”这定数是对生命无常和人世幽微的坦然接受，也是对爱恨情仇和人性隐晦的“了解之同情”。对作家来说，这也是他这些年“知天命”的积极回报——在我看来，写作终究是写作者投注自我的生命写作。

洪放总是别具匠心地描摹出人生的两面与人性的两面，在对照反衬中，揭示生活的真相，凸显生命的意义。在死亡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感恩这些生活中无法躲避的爱恨苦痛，因为正是这些造就了我们，让我们彼此有别，让我们与机器有别。

（作者系安徽大学教授、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父”与“子”：重勘乡土的美学视角

——从浦歌《野生家庭》谈起

□金春平

乡土小说通常蕴含深厚的美学修辞，同时也面临着“普遍经验的焦虑”。不少作品只是既有乡土经验的惯性延续，旧经验的因袭和新话语的阙如，影响了当前乡土小说的思想生长和审美变革。在这一方面，浦歌的《野生家庭》显示出一种自觉的突破意识。作者以人的主观感受为核心书写乡土，有意淡化了历史、城乡、政治等叙事框架，转而聚焦“人”与“大地”的质感肌理，深挖人与土地之间隐秘复杂的关系。“精微”让小说情节简洁克制，“广域”则赋予小说深刻丰饶的哲思意蕴。轻盈的写法和厚重的主题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得以用一种新的视角重新理解乡土，形成一种新鲜的美学风格。

浦歌的小说并不缺乏扎实的乡村生活场景，但他更着力于构建由个体主观感知照亮的广袤、强劲而绚烂的乡村图景。他借助“儿子”这一复合视角——既在场又陌生、既有童年的敏锐又有成人的审视——展开对乡野万物的印象式书写。面对柿子沟、羔羊、植物、飞虫等乡野事物，他调动多重感官，展开联想、想象与通感，任由心绪、情感与直觉涌动，使乡野万物获得了人间的表情，拥有了人类的魂魄。乡野万物不再是被观看的客体，而是满溢着生命力、蕴含着情感力量、内隐着性格变化的主体存在，具有了自我的命运、灵性和喜怒哀乐。同时，浦歌还将感知印象升华为隐形的叙事机制：小说情节往往不是由外部事件推进，而是由情绪的生成、纠葛、矛盾、衍变来驱动。如父亲的一次执拗抗争（《麻雀王国》）、二弟的一次倔强抗争（《狗皮》）、父母之间的一次争吵发泄（《鱼》）、母亲的一次情感冷战（《黑鸡》）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波动，以及主观感知印象在一次次行走跋涉中的变化轨迹，成为驱动情节起承转合的动力。

浦歌从人与乡土的“劳作”关系出发，重新谱绘了人与生灵彼此相通、互为隐喻的乡村图景，探讨人在物性、人性与灵性之间的生命境界。他认可人最基本的物质欲求，向往精神层面的理想，又不流于泛滥与极端，实现了某种微妙的平衡。同时，他也在《野生动物》《狗皮》等小说当中，敏锐写出乡土中国的矛盾：当精神皈依的“确定”和精神疏离的“流浪”彼此悖反，会暴露出生命中荒芜、脆弱、虚无的一面。而在《羔羊》《电猫》等作品中，他在拷问人的残忍与羸弱的同时，也剥离出人们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浦歌写人与生存困境的持续拉扯：对抗时间、记忆、贫穷、劳作、权威与恐惧，记下人在矛盾中的欲望、妥协、溃败、反抗与虚无。这既是对乡土精神的发掘，也是对乡土众生的体察。为承载这种哲思性经验，浦歌设置了“父亲”这一核心意象，构建起“崇父”“逃父”“弑父”“悯父”等不同情节，写出乡村个体密实的情感、坚忍的意志和行动力，以及由此造就的人性质地和命运境况。父亲对荒野的开拓、对农作物的探索、对家畜养殖的信心，都闪耀着乡村“能人”的英雄气质。同时，作为家庭引领者的责任感，也是他的生活压力与精神困顿的来源。作者以悲悯的目光凝望乡野世界，一切的循环往复之中，都隐藏着对存在之谜的彻悟。“父亲”展现出的清醒自适、顺道而行、向光而生，正是浦歌在思索乡土生活的现代主义困境之后，为读者留下的一份文学答案。

（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教授）